

## 透明度与问责制的不确定关系

乔纳森·福克斯 (Jonathan Fox) 著

---

**摘要：**透明度与问责制的含义是紧密联系的：透明度被认为能够引发问责制。本文质疑了这个人们普遍持有的假定。透明度会引起人内心的羞愧，但是那些厚颜无耻的人也许并不会脆弱到在意公开暴光。真相往往不能通往公正。经过对二者不同的定义与维度的研究，越来越多的相关问题涌现了出来：在何种条件下，什么样的透明度会带来哪种问责制？本文总结，二者含义就其各自截然不同的变体而言是可以拆分分析的。透明度不是“清晰的”，就是“模糊的”；而问责制则不是“温和的”，就是“强硬的”。

**关键词：**治理与公共政策、公民社会

虽然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就对知情权有过明确地陈述，但知情权被普遍认同为一项基本的民主权利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sup>1</sup> 世界上超过 60 个国家已经开展了“知情权”改革。这些改革最早于 1966 年从瑞典开始，继而是 1988 年哥伦比亚的改革，现已涵盖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尽管这些国家改革的内容有很大差异（只需设想一下 2002 年在津巴布韦与塔吉克斯坦的改革是多么的富有成效），然而同年墨西哥通过了一项在发展中国家影响最为深远的、关于公众有权使用信息的法律。（Sobel 等人于 2006 年提出；Fox 等人 2007 的相关著作即将刊印）。紧接着，墨西哥的突破性进展被引人注目的 2005 年印度改革所超越——印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行了多项国家级改革与基层运动（参见 Banisar 2006 年的著作）。

在世界范围内，公民社会的倡导者们已经把公众知情权纳入到他们的策略及方法之中，以期透明度能够实现公众赋权，从而通过提高权力机构的公众问责性，来改变权力机构的行为。在更广泛的层面上，透明度与问责制这两个密切相关的

概念已经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各领域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们普遍采纳。这两个概念的普及证明了它们跨意识形态的特质——来自社会上层和底层的力量都在滥用这两个概念。同时，这也突显了将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对象及内容阐述清楚的必要性。个人的透明度就是他人对其的监视。个人的问责制是由于他人的迫使。一个人对待这些问题的角度决定于其身处的位置。这两个概念在本质上相互关联：谁对谁透明？谁又该向谁负责？然而它们共有的特质则是，不同背景的发展工作者们都同意透明度和问责制是“良好治理”的关键——从减贫项目到企业社会责任，再到参与式预算编制和非政府组织管理。

无独有偶，透明度与问责制这两个概念都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因此，自然而然的，这两个概念就可以被理解为适用于所有人，针对任何事。例如，尽管环境运动几十年以来一直高举着呼吁透明度的大旗，呼吁公众关注环境影响，呼吁发布有毒排放物强制性报告，随着安然公司的倒闭，企业投资人也拒绝付款，而是呼吁管理机构公开账目。虽然倡导真实与公平的问责制一直是世界各地人权运动的一项口号，但技术管理者与反工会的政治家们却用它来强加其目标于明显反应迟钝的政府机构（运用报告及其它量化指标）。长久以来，竞选者们以缺乏透明度为由质疑世界银行，并认为世界银行应该为“发展的灾难”负责。但是现在世界银行的管理者们却呼吁借款国政府应更加透明，并声称腐败政府与项目承包商们应该对滥用发展基金的行为负责。世界银行的管理者们现在甚至和世界社会论坛联合起来，支持参与式预算编制——这是一项能同时带来透明度与问责制的地方政府改革策略。

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发展领域中的另一个流行用语）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透明度与问责制定义的严谨程度，并且这种定义性的判断是依赖于路径的。换言之，透明度与问责制“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如何划分二者概念上的界线。此外，关于是否执行社会与环境标准及怎样执行这些标准，国内、国际都有很多争论。虽然评论家呼吁实施问责制，但强大的精英们却代之以提供一定程度的透明——这个趋势似乎很明显。这意味着监测与报告的措施（有时通过有关各方）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也是一个替代权威制裁威胁的市场友好型选择（现在被控为“指挥与控制”的措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关于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争论，劳工和环境双边协议只能承诺公众旁听和开展适度调查，这

成为不力执行最低标准时的解决办法（此种情况同样发生在墨西哥）。简言之，应有更多更好的信息来支持市场及政府当局更好地工作。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证据又说明了什么呢？

传统知识将透明度的作用叙述的简单明了：透明度形成问责制。许多相关词组涌入脑海，比如“信息就是力量”、“真相将让你自由”及“不畏强权仗义执言”。或者，作为公共利益法律创始人之一及后来最高法院的大法官，Louis Brandeis 在一个世纪以前曾说道：“宣传被公正地颂扬为一项社会与工业疾病的补救措施，阳光被认为是最好的消毒剂，电灯被说成是最好的警察。”（参见1913年相关著作）<sup>2</sup>

这一论点会产生许多直观的感觉，但就这一论点查阅以实验为依据的文献，会出现两个主要的难题。首先，目前透明度对问责制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人们掌握的证据显示，其影响并没有人们预期得那样强有力。其次，关于透明度对问责制影响的解释很晦涩，远非公众能普遍接受的，无法清楚地回答“为什么”会让人充满期待。

使用太阳的力量是本能的、最有说服力的。事实上，这些原则一直指导了我过去十五年的工作。<sup>3</sup> 然而，为了寻找透明度与问责制的联系，最近我在查阅试验论证性文献的过程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透明度与问责制中的一个要素未必会引发起另一个。做出二者可以互相引发这一假设的那些人混淆了规范（即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使我们相信的那些规范）与分析（即社会科学允许我们提出的那些分析）。如果透明度的力量建立于“耻辱的力量”之上，那么它对真正无耻行径的影响将会非常有限。<sup>4</sup> 最后的结论是：透明是必要的，但想就此创造问责制，还远远不够。

在此背景下，在以下这些方面重构这一问题非常重要，重构过程需要更多的分析而不是规范：透明度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引发问责制？在实践中探索这个问题是个要求更精确的过程。透明度与问责制的概念涉及到范围很广的社会制度、涉及到不同的当事人与权力关系。那么，对这一问题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则为：什么类型的透明度产生什么类型的问责制？

透明度与问责制都存在一个概念上的问题：它们很少精确定义，它们似乎适用于所有人、趋向于指称一切。对于透明度与问责制来说，当你看到它们的概念，

你就能了解它。至少直到最近，透明度在实践上引起了人们的更多关注，而不是像以前一样，只关注它的概念。<sup>5</sup> 与此相反，问责制的概念则受到了不同观点的审视与深化。<sup>6</sup> 然而，如果某人对透明度是否及怎样产生问责制感兴趣，那么他首要的是理清而不是合并这两种观念。回顾这个关于透明度与问责制的讨论，人们必须考虑到区分问责制的两个层面：一方面，要求答复的能力或权力（Schedler称之为“回应能力”）；另一方面，制裁的能力（参见1999年相关文献）。

## 透明度的路径

公众获取信息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类：主动的与需求驱动的。主动的信息传播主要指政府公布的关于其活动与业绩的信息。主动信息传播涉及的范围很广，可能从公布有毒物质排放清单到有机认证，到第三方政策评估，再到后独裁主义真理委员会。需求驱动的方法指的是对公民获取特定种类资料或文件的要求作出回应的一种制度上的承诺。没有这种承诺将不能取得相应的信息。这些制度的范围也很广，可能从典型的资讯自由法案到司法专员，到“社会责任”机构，再到如世界银行监查小组这样的调查机构。

透明度的概念也可以依据其指向的不同进行拆分。对真相的揭露把两端的路都切开了，信息由此可以向上及向下输送。“知情权”改革被认为是促进从国家到社会的“向下的透明度”。与此相反，政府监督公民的命令则可以理解为“向上的透明度”的一种形式。以有条件现金转移的社会项目为例，在该项目中，国家密切监测家庭行为，或政府缺乏投票保密的措施，这导致选民怀疑当局预先知道投票的结果。也就是说，透明度可以称之为监视的代名词。反过来政客们又要求公民为犯罪行为负责。

## 从透明度到问责制

为什么一些透明度方面的政令能影响到当权机构的行为，而另一些则不能——目前这个问题仍然搞不清楚。一些公众监督机构寻求加强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互相制衡，这些机构强调透明度的产生。通过检查、报告、审计和调查、立法机关听证、巡视官员、真相调查委员会、投诉办公室、和人权委员会，这些“水平问责制”机构使得权力滥用得以曝光。<sup>7</sup> 公民社会组织和独立媒体也投入巨资，鼓励这些官方监督人员履行其职责。但是这些监督实体很少能拥有足够的权力以

针对其发现采取任何措施，无论通过施加强制制裁、政策变更、避免侵犯，或对过去的权力滥用进行赔偿。结果是，透明度的力量，在对公众视线焦点的切实的影响方面，事实上依赖于其他相关机构如何反应。当大众传媒、反对派政党、或投票人围绕新近曝光的权力滥用事件做文章时，这些反应可以是间接的；或者当司法机关或选举机关做出合并的决定作为反应时，它们可以是直接的。

这个观察结果产生了一些进退两难的情形。第一种情形包括问责目标之间的区别：机构或是个人？第二种情形包括对官方信息的质量控制问题。第三种情形包括两种不同类型的透明度：清晰的和模糊的透明度之间的概念性区别。第四种情形把两种类型的问责制也区分开来：温和的和强硬的问责制，使得我们回到最初的问题：在更加精确的程度上详细区分透明度和问责制。

## 透明度的不同目的：个人 vs 机构问责制

在透明度改革可以限制权力的滥用这个普遍假设以外，透明度改革也有不同的目的。其中部分改革策略是为了应对腐败，因此它们关注犯罪；另外一些改革策略是为了鼓励提高整体的制度功能。这些不同的目标包含截然不同的策略。前者更具有法律性，倾向于关注个人违法；而后者则关注整个制度的缺陷。例如，在预算透明度这一领域中，第一种策略更强调披露政府合同的细节，如确保资金按照计划使用。相反，第二种策略会更关注政府开支的影响：政府部门实际上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有效性怎么样。这两种策略都高度分解了政府开支的资料，以及可靠的、公众参与的第三方政策评估。<sup>8</sup> 从公民社会的视角来看，政策影响也有可能依赖于国家公共利益集团与草根组织的“垂直统一管理”。前者监测整个国家的宏伟蓝图，后者能够发掘民间对官方资料真实性的看法（见Fox 2001年相关文献）。

个人和组织的问责性可能不仅仅是不同：有时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任何组织行为都是许多个人决策的集中反映，这就使建立准确问责性的过程变得复杂。汤普森将此定义为“许多只手的问题”（1987年相关文献）。如果目标是揭示某个人对一宗特定违法案例应付的责任，那么公众的聚焦点往往立即投向一个机构应该承担责任的底层或中层人员，从而使高层官员顺利逃脱。<sup>9</sup>

## 资料还是信息？

第二个进退两难的问题是官方资料和相关可靠信息之间的差异。这里不同种类被披露的事件间有很大的差异：主动披露的、名义上要求披露的，和实际上必须披露的。主动披露的资料是有限的，它鼓励人们披露那些有损害性的信息——但也有很多例外。那些顺从社会和环境标准的企业可能在透明度方面的控制有些不力。<sup>10</sup> 这导致了关于哪个证明者是真的“保持一定距离”的争论，正如生产商雇佣商业会计公司审计他们的分销商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的那样，分销商未能使用未经宣布的工厂检查作为主要手段。<sup>11</sup>

考虑到必须披露的业绩资料时，当检验透明度改革影响的“样本案例”——有毒物质排放的详细清单时，确保质量控制的挑战性就很明显。从1986年开始，美国（现在已经扩展到很多国家）要求排放特定化学物质的私营企业向特定的政府机构报告他们的排放量，并向公众公开这些数据。这项假定是通过采取这项措施，可以激励相关法规的出台，迫使这些企业遵守环境法规。<sup>12</sup> 许多分析家指出，在1988-1999年间，美国有毒物质排放明细列表有助于减少46%的有毒物质排放（例如，Fung和O'Rourke 2000年文献；Graham 2002年文献；Konar和Cohen 1997年文献；Stephan 2002年文献）。然而，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的评估显示，环境保护局没有确保私营企业能够提供可靠、有效的报告（GAO 1993年、2001年文献）。结果是排污企业不必担心为不提供报告承担责任。当公共利益部门在休斯顿市开展他们自己的评估的时候，他们发现独立评估真实排放量的结果实际上是官方报告数据的四倍（2004年环境综合项目）。这些发现不意味着改革没有成效，但是，它们确实对得到普遍认可的、官方采用的“命令和控制”策略提出了许多严肃的质疑（例如，Dietz 和 Stern 2002年文献）。理论上命令性的披露最后在实践中变得几乎没有强制性。

## 透明度的两个方面

这把我们引向了进退两难的第三个问题：我们如何解释为什么某些形式的透明度比其他形式的透明度更能影响问责性？这里，怎样区分两种不同形式的透明度：清晰的和难以理解的，就变得很有必要。这个区分之所以有必要是因为透明

度这个话题变得日益流行，与其对立的力量逐渐潜入地下。他们会通过使用不透明的方式，间接表达对立。

难以理解的或模糊的透明度包括如下信息的传递——未能揭示制度在现实中是如何操作的，未能解释决策是如何做出的，或未能展示行动的结果如何。难以理解的或模糊的透明度也指仅在名义上揭示，或是揭示了之后被证实是不可靠的信息。例如，在美国，理论上谁得到农耕补贴，补贴的具体数额，都应该是公开的。但对于实际上公众可以得到的信息而言，一家公众利益监察机构，环境工作组，不得不在六年内对难度较大的技术工作投资1200万美元（Becker 2002年文献）。现在，人们只需登录[www.ewg.org](http://www.ewg.org)这个网站，就能看到得到补贴的名单及具体数额。这个案例提示我们，数目巨大的公民社会投资可能需从名义上的公众资料翻译为清晰、透明的信息。

清晰的透明度即指信息获取制度，也指揭示政府绩效的可靠信息，特别是官员的责任以及政府资金的流向。清晰的透明度强调政府表现，即允许既得利益方（例如政策制定者、决策者及项目参与方）来为有建设性的变革制定政策。关于清晰的透明度的例子包括涉及侵害人权的公民社会资料，私营企业遵循环境标准的执照、调查官员舞弊情况的政府官员的独立报告、公众可以获得的第三方政策评估，甚至是世界银行监察小组的报告。<sup>13</sup>

清晰和模糊之间的区别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如果透明度政策要迎合政府绩效改革的目标，那么这些政策必须在谁做什么，谁得到什么方面是清晰的。然而，清晰的透明度本身并不确保百分之百的问责性，这就要求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干预。回到农耕补助的例子上来，尽管公众利益群体在媒体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后来美国政府对大型农业企业的资助不仅没有缩减，反而大大的增加（由于他们的选举逻辑）。

## 从透明度的两个方面引申至问责性的两个方面

综上所述，模糊和清晰的透明度之间的差异引发了它们与问责制的关系的思考。本文篇幅有限，无法综览公众问责性的各种不同形式，但是它们都关注号召当权者修正决策的基本权利——及“回应能力”的概念。然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后续结果的回应能力往往缺乏问责性。

本讨论仅限于区分问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第一个可以把回应能力成为“温和的”，而“强硬的”包括回应能力加制裁的可能性。表1和2展示了这方面的区别。这两个表一方面展示了既定制度能力的存在或缺失如何与模糊或清晰的透明度相关联，另一方面展示了其与“温和的”及“强硬的”问责制如何关联。两个表用深浅不同的灰色描述了三类不同的制度能力：信息的传播和使用、回应能力，和制裁力或补偿力。这些制度能力的不同充分展示了透明度和问责性的关系。

表1表明，当仅存在信息获取时，一种极端情况是一项制度是透明的，但是没有问责性。另一种极端情况是，问责性包括制裁或补偿的能力。中间的情况是指需要解释的能力，这里列举出来透明度和问责制重叠的部分。最有意义的回应能力是由公众和公民社会组织创造的，它们不仅拥有揭示现有资料的权力，也拥有调查和创造真实的政府绩效信息的权力。这种创造回应的权力使问责性的架构成为可能。

通过列举对比透明度和问责性的两个不同维度——模糊的和清晰的及强硬的与温和的，表2又把二者的不同向前推进了一步。在承认这些差异的基础上，人们可以准确的识别二者重叠的部分，即制度的“回应能力”。

**表1：**透明度和问责制间关系的第一近似值

透明度		问责制	
信息的发布和使用			
制度的“回应能力”			
		制裁、补偿和/或调停	

**表2：**拆分透明度和问责制的关系

透明度		问责制	
模糊的	清晰的	温和的	强硬的
信息的发布和使用			
	制度的“回应能力”		
			制裁、补偿和/或调停

总而言之，此次透明度与问责制之间关系的研究出发点是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因为其中的任何一个概念都无法必然的创造出另外一个。回到透明度如何与问责制关联的问题上去，表2表明，这两个概念事实上相互重叠。清晰的透明度是温和的问责制的一种形式。这个区别允许我们识别透明度的局限性和其带来的可能性，从而有助于我们把期望尽量调整到现实可行。从模糊的透明度里，人们无法期待回应能力，同样人们也无法从回应能力中期待强硬的问责制。下一步研究强硬的问责制涉及到的议题将超出透明度的限制，从管理整体和公民社会能力的本质出发，激励公众问责制本身来实现其目标。

### 注释：

1. 本文修订和摘译自 Fox (2007a) 译本。
2. 值得关注的是，同一位思想家和行动家，认为透明度是对抗滥用集权的有效工具的支持者，他创造和捍卫隐私的权利 (Warren and Brandeis 1890)。国家的透明和公民的隐私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3. 见，例如 Fox 和 Brown (1998) 及 Clark et al. (2003)。一场最近的运动，请登录 [www. bicusa. org](http://www.bicusa.org) 查看。
4. 对于“羞耻感的运用”，首先是人权捍卫者们，例见 Drinan (2001)。
5. 特别复杂的著作，见 Florini (2003), Graham (2002), Hood and Heald (2006), Monsiva'is (2005), Roberts (2006), 及 Oliver (2004)。对于墨西哥公民社会经验的分析，见 Fox (2007b)。
6. 例如，Ackerman (2007), Behn (2001), Bovens (1998), Fox et al. (2007, 即将出版), Isunza Vera 及 Olvera (2006), Mainwaring 及 Welna (2003), O' Donnell (1999), 和 Schedler (1999)。
7. 在横向问责性方面，见 see O' Donnell (1999, 2003)。在真相委托方面，例见 Rotberg, Thompson (2000) 及 Gibson (2005)。
8. 回顾可以发现，例如，以下几个要素之间的差异：政策投入（例如修建学校的预算比例和合同），结果（这些学校是否真的修建了并能供人使用，入学率如何），以及影响（学生们学习的程度如何）。尽管第三方评估目前很流行，它们关注的影响评估也得到普遍认可，考虑到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第三方评估仍然在假定官方资料的可靠性方面承担风险。
9. 早在低等兵在伊拉克的 Abu Ghraib 虐待战俘事件发生之前，经典的案例包括 1968 年越南大屠杀，一名低等军官被指控谋杀了 500 平民。最后的判决

是很罕见的，他先是被判终身监禁，然后又被改判在一个军事基地服刑为期三年半的“软禁”。他声称他“服从判决”，而事实上他是在执行一项镇压叛乱的军事命令，这项军事命令是美国政府最高统帅做出的决策。

10. 对于公平贸易的概述，见 Nichols 及 Opal (2004)。关于木材案例中的义务证明，参见 Cashore et al. (2004)。
11. 文献包括，例如 Esbenshade (2004)，Richter (2001)，及 Rodri' guez-Garavito (2005)。
12. 例如，见 [www.scorecard.org/](http://www.scorecard.org/)网站的工具。
13. 对于后面的经验，见 Clark et al. (2003) 及世界银行 (2003)。

## 参考书目References

- Ackerman, John Mill (ed.)** (2007, forthcoming) *Ma's alla' del Acceso a la Informacio'n: Transparencia, Rendicio'n de Cuentas y Estado de Derecho*, Mexico, DF: Instituto de Acceso a la Informacio'n Pu'blica(IFAI)-Instituto de Investigaciones Juridicas UNAM.
- Banisar, David**, (2006)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round the World 2006: A Global Survey of Access to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aws*, London: Privacy International.
- Becker, Elizabeth** (2002) 'Web site helped change farm policy', New York Times, 24 February.
- Behn, Robert D.** (2001) *Rethinking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 Bovens, Mark** (1998) *The Quest for Responsibility: Accountability and Citizenship in Complex Organ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randeis, Louis** (1995) [1913] *Other People's Money 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 Boston, MA: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
- Cashore, Benjamin, Graeme Auld, and Deanna Newsom** (2004) *Governing Through Markets: Forest Certific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n Non-State Authorit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Clark, Dana, Jonathan Fox, and Kay Treakle (eds.)** (2003) *Demanding Accountability: Civil Society Claims and the World Bank Inspection Panel*,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Dietz, Thomas and Paul C. Stern (eds.)** (2002) *New Tool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Voluntary Measures*,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Drinan, Robert** (2001) *The Mobilization of Shame: A World View of Human Right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Project** (2004) 'Review of 10 toxic air emissions finds "startlingly" bad data reaching public; key flaw: EPA's failure to act and new steps to undermine accuracy of reporting', 22 June, available at [www.commondreams.org/news2004/0622-14.htm](http://www.commondreams.org/news2004/0622-14.htm) (retrieved 8 March 2007).
- Esbenshade, Jill** (2004) *Monitoring Sweatshops: Workers, Consumers and the Global Apparel Industry*, Philadelphia, P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Florini, Ann** (2003) *The Coming Democracy: New Rules for Running a New World*,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Fox, Jonathan** (2001) 'Vertically integrated policy monitoring: a tool for civil society policy advocacy',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0(3): 616–27.

**Fox, Jonathan** (2007a, forthcoming) 'Transparencia y rendición de cuentas: dos conceptos distintos y unarelación incierta', in John Mill Ackerman (ed.).

**Fox, Jonathan** (2007b, forthcoming) *Accountability Politics: Power and Voice in Rural Mexico*,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x, Jonathan and L. David Brown (eds.)** (1998) *The Struggle for Accountability: The World Bank, NGOs and Grassroots Movement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x, Jonathan, Libby Haight, Helena Hofbauer, and Tania Sánchez (eds.)** (2007, forthcoming) *Mexico's Right to Know Reforms: Civil Society Perspectives*, Mexico, DF: FUNDAR/Woodrow Wilson Center.

**Fung, Archon and Dara O'Rourke** (2000) 'Reinvent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the grassroots up: explaining and expanding the success of the toxic release inventor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5(2): 115–27.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1993)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EPA Cannot Ensure the Accuracy of Self-Reported Compliance Monitoring Data', Washington, D.C.: GAO, Report to the Chairman, Committee on Governmental Affairs, US Senate, GAO/RCED-93-21, March.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GAO)** (2001)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PA Should Strengthen Its Efforts to Measure and Encourage Pollution Prevention', Washington, DC: GAO, Report to Congressional Requestors, GAO-01-283, February.

**Gibson, James L.** (2005) 'The truth about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South Afric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6(4): 341–61.

**Graham, Mary** (2002) *Democracy by Disclosure: The Rise of Technopopulism*,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Hood, Christopher and David Heald (eds.)** (2006) *Transparency: The Key to Better Governance?* Oxford: British Academy/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unza Vera, Ernesto and Alberto Olvera (eds.)** (2006) *Democratización, Rendición de Cuentas y Sociedad Civil: Participación Ciudadana y Control Social*, Mexico DF: CIESAS, Universidad Veracruzana/Ed. Miguel Angel Porrua.

**Konar, Shameek and Mark A. Cohen** (1997) 'Information as regulation: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right to know laws on toxic emiss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32(1): 109–24.

**Mainwaring, Scott and Christopher Welna (eds.)** (2003)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in Lati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nsiváis, Alejandro (ed.)** (2005) *Políticas de transparencia: Ciudadanía y rendición de cuentas*, Mexico, DF: Instituto Federal de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Pública/Centro Mexicano para la Filantropía, pp. 17–30.

**Nicholls, Alex and Charlotte Opal** (2004) *Fair Trade: Market-Driven Ethical Consumption*, London: Sage.

**O'Donnell, Guillermo** (1999)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in Andreas Schedler,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p. 29–51.

- O'Donnell, Guillermo (2003) 'Horizontal accountability: the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mistrust,' in Mainwaring and Welna (eds.), pp. 34–54.
- Oliver, Richard (2004) *What is Transparency?* New York, NY: McGraw Hill.
- Richter, Judith (2001) *Holding Corporations Accountable: Corporate Conduct, International Codes and Citizen Action*, London: Zed Books.
- Roberts, Alasdair (2006) *Blacked Out: Government Secre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odri'guez-Garavito, Ce'sar (2005) 'Global governance and labor rights: Codes of Conduct and antisweatshop struggles in global apparel factories in Mexico and Guatemala', *Politics and Society* 33(2): 203–33.
- Rotberg, Robert and Dennis Thompson (eds.) (2000) *Truth v. Justice: The Morality of Truth Commissio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chedler, Andreas (1999) 'Conceptualizing accountability', in Andreas Schedler, Larry Diamond and Marc F. Plattner (eds.) *The Self-Restraining State: Power and Accountability in New Democrac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p. 13–28
- Sobel, David, Bethany A. Davis Noll, Benjamin Fern'andez Bogado, TCC Group, Monroe Price (2006) *The Federal Institute for Access to Public Information in Mexico and a Culture of Transparency*,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Annenberg School for Communication, Project for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 Stephan, Mark (2002)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rograms: they work, but wh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83(1): 190–205.
- Thompson, Dennis (1987) *Political Ethics and Public Offic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arren, Samuel and Louis D. Brandeis (1980) 'The right to privacy', *Harvard Law Review* 4(5), 15 December.
- World Bank (2003) *Accountability at the World Bank: The Inspection Panel 10 Years O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 作者简介:

乔纳森·福克斯 (Jonathan Fox) 是 Santa 州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 从事拉丁美洲和拉丁美洲人类学研究。1980 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位, 1986 年获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博士, 出版了一系列在民主化和加强公民社会建设方面的论述, 特别在墨西哥。目前供职于墨西哥公共利益机构 FUNDAR 主管委员会、设于华盛顿的银行业信息监管中心和美国乐施会。

联系方式: Latin American and Latino Studies Department, Merrill College, Santa Cruz, CA 95064, USA., [jafox@ucsc.edu](mailto:jafox@ucsc.edu).

## 版权声明:

本文作者为乔纳森·福克斯, 首次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 卷号 17, 4-5, 英国乐施会出版, 出版时间为 2007 年 8 月。如需引用, 请参照发表于《实践中的发展》杂志上的英文最终版本。本文系作者个人见解, 不代表英国乐施会、香

港乐施会的组织观点。同时，《实践中的发展》编辑组、英国乐施会等也不承担任何翻译上的错漏的责任。原作及译文的版权均归英国乐施会所有。中文译文的传播将遵循知识共享许可协议，英国乐施会保留部分权利：如需引用请注明出处；不得做任何修改；禁止任何商业用途。更多《实践中的发展》信息请访问网站：[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http://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

This article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article The un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by Jonathan Fox, first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Volume17:4-5 © Oxfam GB, August 2007. For citation purposes, the article as published in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constitutes the final and definitive version. The views and opinions expressed are those of the named autho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Oxfam GB or Oxfam Hong Kong. Neither the editorial staff of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nor Oxfam GB nor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errors of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the original articles and in the translations rests with Oxfam GB.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will be post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with some rights reserved – users must cite the source and may not modify the material or use it commercially.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please visit: [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http://www.developmentinpractice.org)